



## 试析日本对华强硬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伯玉

从2004年下半年始，日本以咄咄逼人的架势在中日间各潜在矛盾领域挑起全面摩擦。先是制定“西南诸岛有事方针”，游说欧盟成员国放弃对华武器出口解禁，进而制定并公布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最近又在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中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日本对华政策缘何日趋强硬？是小泉内阁一时心血来潮，还是长久战略？这种强硬政策的“来龙”与“去脉”如何关联？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种强硬政策？这些令人焦灼的提问就是本文将要尝试探讨与回答的问题。

### 一 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探源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发展开始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国内一度出现要与美国共建世界秩序的呼声。80年代初期，中曾根康弘上台伊始就匆匆忙忙地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竭力扭转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潮。到了90年代，小泽一郎又提出“普通国家论”，为日本新的国家定位做出了新的注解，要求日本在外交上要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在安全领域则要与其他国家一样发挥作用，包括派兵出国、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意味着日本将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多数日本政治家对“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充满自信。“日本可以说‘不’”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

然而，好景不长。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科技水平尤其信息产业与美国的差距拉大，与欧洲各国相比，其优势也多有丧失。与之相反，中国从1991年起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近十年来的GDP平均增长率为世界之首，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结构由原来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在最尖端的科技研究方面开始急起直追，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及一些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想法改变，也反过来影响到日本对华观的变化。诚如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奈尔·西尔佛（Neil E. Silver）所言：“近几年，日中关系的政治力学受国际关系中两极体制的消失、中国的崛起、日本经济的比预想更糟糕的低落这三者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中生代”政治家，似乎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既意识到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又开始积极地“超越历史”，寻求日中关系的新模式。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家的意识转向“超越战后”，希望成为不愿让人“说三道四”、与美中两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日本各界主张以经济实力为背景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家大批走上前台。然而，他们往往却不了解近100年中日之间充满曲折的历史，尤其是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及心理创伤，也不了解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来之不易。这使得由他们主导的日本主流政治意识发生巨大变化，推行对华强硬政策的苗头日趋明显。

### 二 日本对华政策缘何日趋强硬

近年来，日本频频出招。如在历史问题上，小泉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政界主要人物在否认侵略历史方面态度强硬；在钓鱼岛问题上，从政府出钱“租借”钓鱼岛诸岛中部分岛屿，到由政府出面宣布直接接管灯塔并将灯塔标入政府编制的海图，为加强政府“实际控制”造成既成事实；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对中国在无争议海域进行天然气开发横加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以东海域进行能源勘探；在欧盟对华军售问题上，从外相到经济产业大臣都不遗余力地游说欧盟国家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最近，更发生了在公开文件中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并将台湾问题

作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的新事态。日本对华政策缘何如此日趋强硬？

#### （一）由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所决定

近年来，日本政坛新老交替，老一代政治家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在对外关系方面持强硬立场的战略派新生代政治家登场，并逐渐占据政坛主流地位。这些新生代政治家与老一代政治家显著不同，对内对外均以“高姿态”出现。在外交问题上“该说就说”，敢于突破禁区；在国内问题上则以“锐意改革”为旗帜，借以博取舆论与民意的支持。小泉是第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新生代政治家。在目前日本的权力核心中，除小泉外，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外务大臣町村信孝、总务大臣麻生太郎、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等人，在外交和国防上都倾向于对华强硬。主张推动日中关系发展的政治家野中广务、加藤纒一、河野洋平等人已被边缘化，其影响力大大削弱。小泉执政四年来，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国家发展战略。具体地讲，就是军事上寻求“强兵”战略，强化并借助日美军事同盟走向世界，成为所谓的“普通国家”；外交上坚持与美协调优先的路线；在国际问题上主要通过军事、经济手段进行“国际协力”，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基于这种国家发展战略，日本开始对快速发展的中国采取两手政策：在经济上利用中国，即借助中国经济发展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在政治和安全上则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与威胁，开始增强对中国的戒备，将中国视为其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而在国内极力制造反华、厌华舆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对华关系上站在“不怕摩擦”的强硬立场上，摆出以实力对抗甚至不惜武力介入的架势来解决钓鱼岛归属、东海海域划界、海洋资源开发等争端，干预地区事务。总之，其对华政策在向对中国坚决说“不”的方向发展。

#### （二）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右倾化趋势加强的必然反映

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并非是小泉的个人行为所致，而是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右倾化趋势加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促使历史、意识形态等问题凸现并逐渐影响到对华关系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日本民众厌华情绪显著增强，对华强硬比较容易得到民意的支持。2004年12月18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较2003年进行的上一次调查减少了10.3个百分点，下降到37.6%。这是自1975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最低的一次。有六成多日本人对中国感到不亲近。
2. 舆论右倾化倾向增强。近年来，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逐渐上升，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观点在日本国内颇有市场。在趋同心理极强的社会传统影响之下，一些原本相对客观的主流媒体正在向右转。战后相对宽松、平和的舆论环境已经面目全非，坚持日中友好的言论和主张很难在媒体上出现，相反，敌视中国的言论却被部分日本媒体大肆报道，如中岛岭雄、冈崎久彦、古森义久等人的反华文章常在《产经新闻》大篇幅刊登，毒化日本舆论。
3. 日本民间右翼势力活动猖獗。有中国学者指出，如今，日本精英层中谁要为日中关系说句公道话，轻者受到右翼势力的电话恐吓，重者家中就会被丢进子弹或炸弹。如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主任委员小林阳太郎要求小泉不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后，便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恐吓。起初是右翼分子的宣传车经常围堵小林住宅，后来发展到向小林住宅门口掷燃烧瓶的地步。日本皇民党还于2004年4月制造了用宣传车闯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事件。日本青年社多次登上钓鱼岛。

#### （三）欲借美国身陷中东和西亚，无暇东顾，需要日本在亚洲分担更多责任之机遇制中国，“联美制华”，控制东亚

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其主要动因是日本自身的战略取向，但也必须看到其主动借助、利用美国“联日制华”战略的一面。日本自身在军事和外交上还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不敢单独有所举动。但日本将继续依靠美国的军事强权与中国对峙。冷战期间，日本曾被动地置身于美国的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之中。冷战结束后特别是现在，日本已不再是被动追随美国，而是主动地将自己与美国的东亚和全球安全战略捆绑在一起，主动地借助、利用、影响美国。尽管美日两国仍强调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但从最近日本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美日明确提出应对台海局势是其共同战略目标来看，日本的“联美制华”战略与美国的“联日制华”战略互相配合，日美对华军事战略已走向“一体化”，企图建立以美日为主导的东亚秩序。对此，有中国学者指出，未来中美日三边关系格局有可能滑向美日在安全领域共同对付中国的“二对一”格局。

#### （四）借外交攻势转移内政颓势

小泉执政三年多来，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结构性改革阻力重重，进展甚微。内阁支持率持续下降，已由执政初期接近90%的高水准跌到目前的30%多一点。同时，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的实力不断上升，对政权虎视眈眈，使自民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为扭转这种局面，小泉的对策是设法转移国民视线，将矛头对外，转移民众的不满，迎合日趋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姿态，为自己塑造敢于捍卫日本国家利益的强势政治家形象，重新博取选民支持。

### 三日本对华强硬政策将会持续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的对华强硬政策浮出水面，恰恰发生在中国根据自己的睦邻外交政策着手改善中日关系上的“政冷经热”局面的努力过程中。这种中方越是善意亲和、日方越是冷峻回应的“负相关状态”，昭示着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未来几年内不大可能“风平浪静”，中日摩擦的基本格局还将持续下去。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1. 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是日本国内政治发生质变的必然结果。而日本政坛权力核心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自民党更不会在短期内调整对华方针，中日关系将会摩擦不断。这种状况在小泉内阁期间不会改变，在后小泉时代也不会很快发生变

化。小泉下台后，自民党内无论是强硬派当权，还是温和派主政，日本对华强硬政策都将会执行下去。中日政治关系将会迎来一个严峻的季节。

2. 日本即使出现了民主党政权，对华强硬政策也不会有大的改变。随着1955年体制的解体，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势力日渐衰落，战后初期形成的保守对立格局已不复存在，正在形成自民党、民主党分别主宰朝野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目前，这两个政党占据了国会参众两院70%以上的议席。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政策差别不大，如在修改宪法问题上，两者都主张修改宪法，只是在修改的具体内容方面意见不同。曾有读者在日本大报上对自民党与民主党的区别作如下的比喻：一个是“咖喱饭”，另一个是“饭加咖喱”。在某些方面，民主党甚至比自民党走得更远。如目前民主党在准备提交国会的《资源勘测限制法案》中，明确表示要对在东海专属经济区进行海洋资源勘察或从事海洋科学考察的中国船只动武。

3. 社民党、共产党等革新在野党所起的牵制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如上所述，冷战结束后，在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的趋势下，主张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历史、高举护宪旗帜的日共和社民党所起的牵制作用，同1955年体制时期相比已经今非昔比。对于日本的这一变化，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做好长期应对的心理准备。为此，我们应该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基础上，深化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时重视发展民间外交，扩大民间友好合作与交往。民间友好是我们对日工作的传统优势。在目前中日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困难时期，更需要深入、扎实地开展对日民间外交，团结绝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士，孤立极少数顽固的右翼分子。

2004年12月10日，日本内阁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并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明确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该大纲在第二部分即关于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部分中指出：“对该地区安全保障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武器及导弹战斗力与海空军现代化的同时，正在谋求扩大海上活动范围，今后有必要继续关注此种动向。”

2005年2月19日，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该声明指出：“亚太地区共同的战略目标包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欢迎该国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及建设性的作用；推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促进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

实际上，自民党草案中追随美国的单边主义、走向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字里行间都在明火执仗地搞正式军队、主张发动集体自卫权。相形之下，民主党的宪法草案从文字表述上看调门比自民党要低一些，但所谓“最大限度地限制”这一定语之后使用的仍然是“行使武力”。所以，就其本质讲，同样是对现行宪法中“放弃集体自卫权”原则的否定。相关问题可参见日本民主党2004年10月发表的《宪法提言中期报告》，以及自民党2004年7月在《自由民主》杂志上公布的《宪法修改要点》。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 ijs@cass.org.cn